

Leading Captivity Captive: 'The Exile' as History and Ideology / Lester L. Grabbe(ed.)-- Sheffield: Sheffield Academic Press, 1998.-- (JSOTSup. 278) pp.161.
ISBN 1-85075-907-3

台神圖書館索書號:BS1199 B3 L4 1998

這本書一看到它的書題，就覺得很有趣，而且吸引人。這是一本論文集它收集了8篇文章，發表於 Lausanne 的「舊約歷史方法論」的研討會上於 1997 夏（七月 27 - 30 日）。

當然在這研討會上也牽涉了近年來有關探討「以色列史」的一個主題：即學者間已常用兩個不同字眼來形容他們之間的分野。一者是 **Maximalist**，即在論以色列史時，所採證的考古學證據或其他文獻證據時是主張盡可能採廣義解釋，也就是評價到最大的極限。另一個字即是這評論的另一面，採 **Minimolist**，即所有引用或應用的資料，以狹義的解釋，採最低的可能性。由於有此兩種的區別，讀者不難在這些論述的過程中，發覺學者的不同主張。也許有了這些不同的主張，才使這個主題更具討論的價值，也澄清有關以色列史的神秘面紗。

這八篇文章（不含導論）分別是：

- ①R. Albertz 的論作，以新巴比倫王的歷史記載為基本資料，來檢視／探討被擄時期的歷史（22-39）。他提出一個有趣的考古學證據，這證據顯示出當學論及被擄時的一個困境，到底這段時期是如何？他認為是一個「深洞」(a black hole)。因考古學上新發現在主前第八世紀開始至第七或第六世紀時，在猶大的地區內的人口銳減了 25%。問題是這個人口忽然流失的原因是什麼？是指西拿基立攻擊耶路撒冷時所帶來的後果或是後來亡國被擄巴比倫，所引起的人口流失？在這一點上，聖經的資料所顯示出的就不足，而無法判斷。這同時也引發出另一個問題，即聖經有關被擄這一段的歷史是後來的寫作，而不是真實的歷史資料，因此在比對其他近東文獻時，它就無法提供有效、正確的答案。也因此論述這段歷史時所採納的資料就落在巴比倫的文獻上未做為依據和分析了。
- ②B. Becking, "Ezra's Re-enactment of the Exile"(40-61)於此作者提出了一個有趣且值得深思的問題。到底以斯拉書提供了什麼歷史資料證據，足以支持何時為被擄的年代？或是被擄時期的結束？有足夠的資料可以顯示出被擄的人群中和回歸的人群中有親族的關係嗎？更進一步，他提出以斯拉書是否提供了未被擄去巴比倫，而餘留在耶路撒冷或其他地區的人群有發生過什麼事嗎？作者結論是認為經文是經文，它本身是經過篩選的敘述(Narrative)，談及有關「被擄的事件」，但它（經文）並不是歷史事件本身。因此將經文做為歷史資料來判讀時有其困難性，而且也不通。特別是被擄後的以斯拉書，因具有強烈的護教因素，為保護猶太人的宗教和政治的地位而有所辯護。特別有關聖殿和律法(Torah)是站在 YHWH 主義的立場，故有所偏頗。但作者仍懷著信心稱有可能重建這時期的歷史，這要依如何採證和方法論而已。

③R. P. Carroll, “Exile! What Exile?” *Deportation and the Discourses of Diaspora*”(62-79)：由題目本身，讀者就不難看出作者對「被擄」(Exile)這個名詞或概念大表懷疑。他認為用這個名詞本身就是舊約論述亡國後(587B.C.E.)的大困境。作者認為「被擄」一詞是舊約的修詞或比喻的字眼，而不表示它具有某種特殊「歷史事件」的記載。因此作者認為這段歷史以「被擄」的方式描述出來，具有舊約本身的神話性和意識型態的架構。因在這段時期內的舊約經文本本身和聖經以外的文獻看來。幾乎很少有相通或相近的地方。有趣的事是作者引用一位舊約學者 C. C. Torrey 的理論(*Ezra Studies*, 1910)稱正典內的經文所代表的是為一群以耶路撒冷為中心的神學家寫出來的作品，而這些作品即被當時以耶路撒冷為中心的神學意識型態所污染。因此，他認為這些書卷有一強烈意識型態灌注於他們的著作中，而影響到讀這些希伯來經典的人，也會有相同的「意識型態」。因而作者認定任何於此時期所講的「歷史」作品其實含有這時期的「意識型態」的歷史。這種論述是非常具有挑戰性，您認為呢？

④L. L. Grabbe, “The ‘Exile’ under the Theodolite: Historiography as Triangulation”(80-100)：作者在本篇中論及三個主旨：

i)被擄的族群(Communities)和回歸的人群是否失落了他們的認同感？

ii)聖經的經文和其他外在的文獻如何為這時期作比對？

iii)這時期的真正歷史「原貌」是什麼？作者提供由外在歷史資料特別是亞述記載有關撒瑪利亞的文件來做案例，此以推論巴比倫文獻記載有關約雅斤被擄事件。這種方式是很新鮮有趣。但結果作者認定有關約雅斤被擄的事件，沒有其他外在的文獻能充分支持耶路撒冷被攻陷及被擄。因此，他期待有更多外來的文獻來支持聖經的記載。

⑤Thoms L. Thompson, “The Exile-History and Myth: A Response to Hans Barstad.”(101-18)：本篇文章是在回應 Hans M. Barstad 所著的書 *The Myth of the Empty Land: A Study in the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of Judah During the “Exile” Period*. (Symbolae Osloenses Fase. Supple. 28: Oslo: Scandinavian Univ. Press, 1996), ISBN 82-00-22756-1。Barstad 認為「被擄」並非出自真的歷史事件，而是出自他們的幻想或說是 Myth。他的理由是若在這「被擄」的時期是真事的話，那麼在猶大地區必造成大量的人口外流、經濟、宗教和文化也必定造成大量的流失，百業俱廢，生濟消滌。但依 Barstad 的查證相關的文件，如巴比倫文獻、考古文件等等，顯示出的資料卻正好相反。不僅僅未見到「被擄」的百姓所面對的那種悲慘世界，百業消滌，反而是有許多商業、經濟上的來往，而且長期以來維持 587B.C.以前對巴比倫帝國的進口大宗物質，如油、酒等等農產品。如此看來，Barstad 結論是這種「被擄」說，乃出自民族的「迷思」(Myth)。

而本篇作者 Thompson 則認為這本書帶給學界一大的困擾。若是依 Barstad 氏的理論，稱聖經的經文缺乏詳細討論或完整記載當時的事件如被擄，或回歸就把它們劃歸為比喻似的文學創作，那如何去解釋詩篇第一篇和第二篇的文學脈絡傳統，是否他們也不是歷史了？

- ⑥Hans M. Barstad, “The Strange Fear of Bible: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Bibliophobia’ in Recent Ancient Israelite Historiography”(120-27)。
- ⑦P. R. Davies, “Exile? What Exile? Whose Exile?”(123-38): 作者自認他是較傾向於所講的「新歷史」學派的人物。他認為一則故事被描述出來且能夠為人所接受是因為它和當代的興趣，利益，意識型態有密切的關係。而「被擄」這個記載之所以被保存下來是因它披著當代的政治、社會和經濟生活的糖衣—即意識型態而寫作下來。因此他認定「被擄」不是以色列史的最後樂章，而是反應出波斯時期猶大的「意識型態」。且「被擄」前的這些猶大王也是出自這群人的神學立場所做的溯源論。
- ⑧Knud Jeppesen, “Exile a Period-Exile a Myth”(139-44): 最後，作者 Jeppesen 藉此綜合上面的各家學說討論，擬出一條綜合之路，認為「被擄」事件是同時可視為以色列歷史的某一時期，但同時也可認定為比喻似的“迷思”。要重建這段歷史（被擄的歷史）是有可能，就如說故事時一樣一定有加入說故事時的藝術層面。是具有對某事件的深入體會的語言呈現。因此他認為「被擄」的事件，無論它是一則歷史事件或是出自意識型態的迷思。它都具某一層面的深沈體驗。最重要的是讀者不應把這兩個範疇混為一起。

這本書雖是經過許多不同學者所發表的不同想法。但它的確提供了我們思考的空間，到底我們自己對這些問題了解了多少，又如何去面對它和解釋它？到底聖經經文所要呈現的是什麼？歷史嗎？神學反省？或某種意識型態？或是見證？但又見證什麼？這是一本值得品嚐的書籍。至少也可學到學者如何引發問題，思考模式，及舉証支持自己的觀點。